

新中国日本史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玉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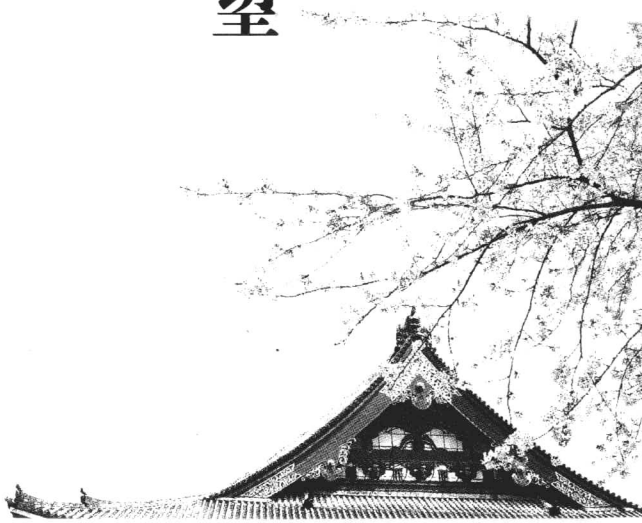


李玉 主编

新中国日本史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玉主编.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696-954-0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日本—历史—研究—概况—中国—现代 IV. ①K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4850号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李玉/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875 字数37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54-0

定 价: 42.00元

编委会

北京大学 李 玉

南开大学 杨栋梁

复旦大学 胡令远

前 言

2011年4月12日,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与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会议,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业已退居二线的30余位日本史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为中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在这些学者中,令人崇敬的“三老”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先生,不仅学识渊博、硕果累累,而且含辛茹苦,培育了一批新人,缔造了数支团队。他们作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者”名存史册,成为后辈学者的楷模。在“三老”的统领下,一批事业心强、功力扎实、刻苦实干的学者们担起了科学研究与教书育人的重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作为“拓荒者”所进行的深入、开创性研究,整体提升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水平,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尊重;他们培养的新生代学者,已成为当代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承前启后,代代薪火相传。抚今追昔,奠基

者和拓荒者们艰辛历程、敬业刻苦、学术造诣、正己育人、治学严谨的业绩和经验,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总结,发扬光大,以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持续、深入发展。这正是举办此次会议的出发点和宗旨。

基于这一宗旨,研讨会围绕下述主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一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成果、经验与个人心得”,即结合中国日本史学界和个人的研究历程,介绍和点评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时代影响的成果;总结理论建树、研究方法、资料搜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二是“对当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评估及重点研究课题的建议”,即从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史料搜集与鉴别、前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学术氛围、人才培养、重点和焦点研究课题等角度出发,就当前中国日本史学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为今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与会者年纪最大的已年过八旬,最小的也60有余,但都满怀热情,积极参与,会前认真准备,会上踊跃发言,会后按时交稿。正因如此,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后亦顺利地完成了本文集的编辑。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文集,真实地表达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开拓者们的感情,这种情感袒露了作者本身对推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作出贡献的欣慰和自豪,以及对未来中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憧憬和对年轻研究者的殷切期望。

为便于阅读,本文集由以下部分组成。“奠基者的劳绩”收入3篇文章,逐一介绍和论述了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等“三老”的道德文章,以及他们作为引领者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先哲学者的贡献”收入2篇文章,专门介绍和评述了在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前辈王辑五先生和吴杰先生的生平业绩。“拓荒者的感言”收入22篇文章,包括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经验教训的总结、日本史研究视角和方法的阐述、个人从事研究

教学的经历和体会、对若干重要研究课题或著作的评介和看法、学会活动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体验等,内容丰富,事例感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与硕果”收入6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变化的历程,按历史时期或专题介绍和评价了我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成果。“附录一”为“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纪要,与会者的真知灼见跃然纸上。“附录二”是与会者的个人简介。

在此次研讨会的策划、准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汤重南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令远教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在研讨会结束之后,杨栋梁教授倾注全力,认真、细致地审阅了稿件,付出了辛劳。值此文集出版之际,特向上述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学术讨论自由,尊重作者观点的考虑,对作者的学术观点,编者不作任何改动,实行文责自负的原则,各篇文章均为作者个人所见,不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和编者。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因编者水平有限,文集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0月

目 录

第一篇 奠基者的劳绩

周一良先生与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 汤重南 宋成有 ... 2
坎坷人生路、文途武道始为伊

——记吴廷璆先生 / 杨栋梁 ... 27

修身见于世、独善之间谋兼善

——记邹有恒先生 / 周颂伦 杨孝臣 ... 43

第二篇 先哲学者的贡献

吴杰先生的日本史学术研究活动 / 翟 新 ... 60

王辑五与日本史研究 / 叶昌纲 ... 67

第三篇 拓荒者的感言

反思与希望——关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 / 吕万和 ... 78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 王晓秋 ... 87

战后日本史研究中的几点浅见 / 王振锁 ... 103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 蒋立峰 ... 116

我从事阁日关系史研究的一点体会 / 叶昌纲 ... 124

参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的回顾 / 孙仁宗	… 129
1980 年以来中国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回顾 / 孙玉玲	… 143
1989 年复旦版《日本通史》编著出版后的体悟 / 赵建民	… 163
日本史研究中的几点感言 / 刘予苇	… 174
结缘“日本历史”五十载 / 沈仁安	… 179
我的日本研究拓荒之路 / 田 桓	… 182
学习日本历史的回忆 / 周启乾	… 200
关于日本史研究的点滴体会 / 米庆余	… 207
交流、求索四十年 / 马兴国	… 210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与学会活动 / 王吉林	… 222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六十年有感 / 邵继勇	… 236
直抒胸臆: 怎么才能搞好日本史研究 / 汤重南	… 257
总结经验, 克服弱点, 开辟日本史研究的新局面 / 夏应元	… 261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希望在新生代 / 宋成有	… 267
相知, 方有未来 / 李崇义 孙光礼	… 269
儒学思想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新探 / 刘明翰	… 275
老革命家的新贡献——忆于林书记 / 郎维成	… 291

第四篇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与硕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1949—1989) / 汤重南	… 300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轨迹 / 宋成有	… 321
古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	
——以日本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 / 李 玉	… 351
古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	
——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 / 李 玉	… 378
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 21 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 / 王吉林	… 406
近十余年来的中国日本史研究概述 / 宋成有	… 419

附录一: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纪要 / 杨栋梁	… 447
----------------------------------	-------

附录二: 作者及学术讨论会发言人简介	… 455
--------------------	-------

第一篇

奠基者的劳绩

周一良先生与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汤重南 宋成有

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周先生在世界史、亚洲史、日本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和佛教史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更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求真精神、严谨学风与平实谦和的为人而深受海内外学人的赞誉和推崇。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介绍周先生在中国日本史研究领域的业绩,倘有不足,敬请指教。

一、治学与人生

周一良先生祖籍安徽东至,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曾祖父周馥早年投军李鸿章幕下,后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晚年在其所著《负暄闲语》中,历数清季中国外交之艰难,自谓“我但求有益于国于民,何尝计及一己利害”^①。祖父周学海于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但他心不在仕途而性喜医学,临床医术高明,所著《脉学四种》、《脉义简摩》、《辨脉平脉

① 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章句》、《形色外诊简摩》、《伤寒补例》、《读医随笔》等医书均收入《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1891—1984)为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和文物鉴赏家,一生爱国利民,逝世前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高层次传统文化教养的熏陶,对其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从8岁起,在天津家塾苦读10年,饱读“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学作古文,研读清儒考据著作,所延塾师皆为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在其训导之下,周先生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乾嘉朴学的基础坚实,国学根基深厚;兼练书法,工篆刻。自11岁起,随日本家庭教师二人学习日语4年;自15岁起,又随英国家庭教师学习英语3年,熟练掌握日语和英语两门语言,于其后的学术发展,功莫大焉。

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一年。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作二年级的插班生,1935年毕业。在燕大读本科期间,受到一代史学大家邓之诚(文如)、洪叶(煨莲)诸先生启迪,对魏晋南北朝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复受考据学和史科学严格训练,精学猛进。读本科期间,即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处女作《魏收之史学》,质疑定说;还发表了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译作,展现了科研实力。在邓之诚先生的指教下,以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其间,到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一亮,由衷佩服”^①,遂对陈先生执弟子礼,倾心听从指教。陈先生对“富而好学”的周先生印象颇佳,特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作助理员。周先生对史语所的一年流连难忘,说:“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

^① 周一良:《学术自述》,《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写出来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外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①文中提到的文章,即《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周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等多种外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间,师事“东方日本学之父”叶理绥教授和梵文名学者柯拉克教授,学业大有长进。与此同时,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194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毕业后,留哈佛任教2年,教授日文2年。

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讲授日语和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3所学校的日本史课程的讲授。这一期间,文思如泉涌,先后撰写了《乞货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译》、《能仁与能祠》、《杂抄考》等涉及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和敦煌学等领域有分量的论文,足以体现学术水平和专长所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与北京大学的季羨林、马坚、金克木,清华大学的邵循正以及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著名学者,共同组建了学术沙龙东方学会,相互启迪,同求学术真谛。1951—1952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周先生调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先后担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2001年谢世,周先生在燕园渡过了49个春秋。历年来,在各校讲授的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代之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

① 周一良:《史语所一年》,《郊叟曝言》,第86页。

史文选等。历任《世界通史》(四卷本)主编之一、《东方文化丛书》主编之一、《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历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等学术兼职。

周先生通晓英语、日语,亦学过梵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等多种外语,自1955年与翦伯赞先生同行,出席在荷兰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大会,至1997年应邀前往日本接受山片蟠桃奖,先后访问荷兰、法国、摩洛哥、巴基斯坦、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日本、美国、韩国,促进友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多次。

自1966—1978年“文革”和“两个凡是”的12年间,周先生历尽人生的起伏坎坷。在1967—1968年北大两派激烈的派性争斗期间,曾经被红卫兵抄家、扣发工资,被戴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老保翻天的急先锋”等一连串的大帽子,被迫接受“喷气式”的揪斗、“罚跪”和“游斗”,饱受人身侮辱。还被解送到历史系在昌平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基地或校内民主楼后身的“牛棚”中,遭受“群众专政”名义下的非法拘押和“劳动改造”。1973年服从党组织安排,参加“梁效”的注释组,解说《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的历史典故,发表《诸葛亮与法家路线》(《历史研究》),出版《读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曾经作为中共“十大”代表,进入主席团。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名列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审查两年。在此期间,周先生并未虚度光阴,而是重拾停顿了30余年的魏晋南北朝研究,熟悉史料,考证物事典故,积累史料,写作札记。

1979年,周先生重新回到北大历史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古研究中心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在世界史研究室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此时,虽已年逾花甲,但以老骥伏枥的勤奋精神,埋头魏晋南北朝和日本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担任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出访日本、法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85年退休,愈加奋发有为,成就斐然。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学术著述,发表论文多篇。出访美国、日本,搜集资料、开展研究。周先生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业绩显著,备受同行、晚学后辈的瞩目与尊敬。

1997年周先生患帕金森症,加之在北大燕东园43年居住背阴房屋,因缺少阳光而缺钙,导致多次骨折。虽备受病痛折磨,但依旧耕耘不止。着手翻译江户时代武士道代表作《叶隐》约三分之一篇幅,可惜天不增寿,未来得及完成全文,2001年10月23日夜,在居屋安寝中仙逝,享年88岁。有关周先生的家世和人生感悟著作,主要见于《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著,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奠基新中国成立后的日本史研究

周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即进入日本史研究领域。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已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1934年,在燕大《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上,发表论文《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上之贡献》,汉译大谷胜真的《安西四镇之建置及其异同》(《禹贡》第1卷第11期)、内藤湖南的《都尔鼻考》(《禹贡》第2卷第3期),展示了专业研究的潜力和熟练掌握日语的语言优势,颇受好评。业师洪煊莲先生为给燕京大学培养日本史教师,为其指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周先生谨奉师命,即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旋刊登于《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这篇学位论文分成引言、日本史学史沿

革、《大日本史》的编纂、《大日本史》之史学、结论等五部分,重点探讨了《大日本史》编纂者德川光圀、史部及编撰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迟原因,及修史的史观、体裁、义例等问题,对“三大特笔及断限”、纪传之确定原则、书法及载文等项展开分析;还对这部史著中的“求是”、“存疑”、“抵触”、“脱误”、“纪传与志之比较”等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对史著使用的古汉语,逐一作出评述。这篇学位论文用中国史的传统标准,评论《大日本史》,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加藤繁教授在其著作《日本史学史》中,“大段引用”周先生的评述。在回忆中,周先生说,“当时对这篇论文题目的意义认识不够”,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研究并评论日本重要历史著作的第一篇文章,而且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与重视,不宜妄自菲薄”。^①

1952年来北大历史系开创亚洲史新学科,首先着手日本古代史并兼涉朝鲜、越南的教学科研。原本以中国古代史为专攻领域且作出若干业绩,何以转行?在晚年的回忆中,周先生对其原委作出了解释:“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②1958年《亚洲各国古代史》出版,此著是在1956年周先生开设亚洲各国古代史课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堪称我国亚洲史起步的开篇之作。在《导论》中,周先生强调“亚洲各国史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无限的前途,是中国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去开辟的广阔园地”^③。

《亚洲各国古代史》共计5章,日本、朝鲜上古、中世史各两章,越南古代史一章。每章的论述,史籍记述与考古资料并重,从3个国家

① 周一良:《郊叟曝言》,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② 周一良:《学术自述》,《郊叟曝言》,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③ 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的地理和居民说起,依次评述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的发展轨迹,直至16世纪末。日本古代史的篇幅约为全书的二分之一,提出有关日本古代史的若干观点。例如,认为日本虽然也是“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但特殊的是日本奴隶制不发达”,原因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分工及交换不发达、奴隶来源枯竭、中国封建剥削方式的影响。作为贵族剥削的主要对象“部民”,与奴隶有着居住方式、管理方式、生产工具、人身所属等方面的区别,但对其社会属性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认为645年的“大化改新”标志着日本主要地区转入封建时期;七八世纪是日本模仿中国文化的时期,但主要流传在日本社会的上层;庄园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处于农奴地位的庄民;独立的手工业者“座”和“问丸”等独立的商业机构的出现,使自然经济日趋瓦解;出于统一的需要,织田信长动用了武力和当时传入日本的天主教来打击佛教;天主教的扩张野心和佛教指责其“无父无君”,促使丰臣秀吉决心禁教;织丰时代日本对外贸易很发达,有很大可能刺激日本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有推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等^①。勾勒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古代史的论述框架。

除亚洲史之外,周先生还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日本史》、《日本近现代史专题讲座》等选修课程,培养研究生。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年代和所谓“回潮”时期的1962年,撰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以及为诺曼著《明治维新史》的引言、《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荣西与南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等多篇论文。此外,还在历史学会上宣读论文《日本近代史分期兼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原本拟撰写论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因1966年“文革”骤至而搁笔。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周先

^① 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第16、17、18、19、28、30、38、39、47、51页。